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社会现实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

[比利时] 欧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著

颜岩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4005434

A81
192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社会现实

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Social Reality
in the 20th Century



[比利时] 欧内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著
颜岩 译



北航

C169315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A81
192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编委会名单

主编

庄福龄 罗国杰 靳 诺

委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陈先达 程恩富

顾海良 顾钰民 郭建宁

韩 震 郝立新 贺耀敏

侯惠勤 鲁克俭 梅荣政

秦 宣 石仲泉 吴易风

张雷声 郑杭生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 言



当把一些最初独立写成的论文结集成书时，内容编排上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显然，其中一种便是将所有内容仅仅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另一种则是按照主题或者问题排列。我选择将本书内容分为三个大类：历史文论、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理论方面的其他问题。在这些宽泛的主题范围内，论文按时间先后的顺序排列（列宁主义的组织问题除外）。

将组织与一种纲领性或理论性质的其他问题分开，甚至颠倒该部分所属两个篇目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既有实践上的原因，也有教习上的原因。专门探讨组织问题的有两篇论文，如果我将它们与其他理论作品合并，即将本书仅仅分为两个部分，结果便可能会使第一部分明显少于第二部分。因此，三个部分的结构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样做也符合我编排材料时的目标，即力图使曼德尔（Mandel）较为理论化的著作在那些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术语不甚了解的读者那里并不那么扎眼。因此，较短小、较通俗的篇目出现在第一部分，以便对这些基本观点和概念进行介绍，在逻辑上紧随其后的是第二部分的第一个篇目，由于它最初以非书面的演讲形式发表，故对于那些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期经验的人来说，应该更容易接受。在阅读第二个较长篇目（详尽考察了列宁政党组织概念的哲学理论基础）之前先阅读这个篇目，将有助于在第一部分较易理解的材料与第二部分较长、较抽象的论文之间形成一个过渡。



当为了再版而编辑过去的作品时——事情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甚至更远，那时，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由于第二波女权主义）西方语言中存在固有的性别歧视——人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困境：用男性方式指代整个人类意欲何为？在本卷中，这个问题尤其凸显于 1947 年首次发表的《托洛茨基：其人其业》（Trotsky: The Man and His Work）一文中。在这一点上，我选择不更改最初英文版原貌的方式，请读者们谨记，但凡用“他”和“男性”这样的词汇指代整个人类的地方，均源于材料写作年代的一种普遍知识倾向。在后期的著作中，曼德尔自己纠正了这一点——不仅在语言上，也在社会总体意义上承认了女性完全平等（这也是在全书所有文章中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普遍主题）。

对于那些并非曼德尔所加的注释，我们将指明出处，并以“英译者注”或“编者注”的形式标出。

史蒂夫·布卢姆

目 录

导 论	1
-----------	---

第一部分 历史文论

1. 托洛茨基：其人其业	7
2. 罗莎·卢森堡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	23
3. 托洛茨基的经济观点与今日苏联	42

第二部分 列宁主义的组织

4. 先锋党	53
5. 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对于当代的现实意义	70

第三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理论

6. 什么是不断革命论？	121
7. 建立第四国际的理由及其今日缘何依然有效	133
8. 马克思主义对今日革命的辩护	168

译后记	196
-----------	-----

导 论

本书中最早的一篇论文发表于1947年，最晚的一篇发表于1990年，曼德尔关于第四国际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著作和贡献横亘了40多个春秋，人们甚至可以将曼德尔在世界托洛茨基运动中的活动进一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更早）时期欧洲的反纳粹斗争。

至少可以这样说，一个年轻的革命激进分子长期保有革命意识和承诺，直到成为我们所说的年迈的革命激进分子，这是十分罕见的。大多数情况下，年轻的激情会在重压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无穷无尽的物质压力面前屈服，或由于斗争的困难而屈从于愤世嫉俗和道德败坏，再或成为血腥镇压（通常打击那些为人类解放而战的人）的牺牲品。

我们的运动因这种通常意义上的个人急速反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缔造一个革命组织的过程中，一个甚至拥有十年经验的激进分子将不可避免地获取大量的实践知识。如果我们将这些实践知识与少量理论化、纲领性的理解结合起来（这些理解要么通过基本的教育性著作获得，要么在处理阶级斗争出现的具体问题时获得），便不难发现用一个新成员去取代一个失去的干部是多么困难。有多少人隶属于组织这一问题另有深意，我们还必须询问，这些人到底能够表现出多少集体意识和经验。

在阅读本书时，牢记这个一般性的问题是重要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活跃的革命领导者，欧内斯特·曼德尔持续70年之久的生命历程绝不



能作为个人来称颂)，确切地说，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论文背后的东西，这是一种对劳动人民的事业、对钻研（推动）社会变革的纲领和理论以及对半个多世纪斗争中相当丰富的经验真正意义深远的承诺。

众所周知，多年来曼德尔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正如本书涵盖的广泛主题所清楚表明的，曼德尔的经历和专长并不仅仅限于经济学，其范围从 20 世纪初对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社会民主运动中的作用的评价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世界中应用的一系列讨论不等（中间涵盖夹杂着大量领域）。然而，尽管主题多种多样，但仍有大量线索可以将本书所有材料结合在一起。

同任何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曼德尔展现了一种真正的方法论的一致性。在许多方面，他的著作可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好的入门级教科书（因为它们阐明了如何自觉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并将之运用于生活，阐明了如何让人们运用这些辩证法更好地理解我们居存的现实，并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现实的可能性变化的真正洞见）。从各个方面看，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入手，要比从不同哲学观点的抽象讨论入手更为有效（尽管继续对理论上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身，一定会使每一个激进行动者更好地理解事件在社会中的运行方式，进而增强他们分析和用行动改变现实的能力）。

在我们阅读本书时，意识到方法论的重要性具有特殊的意义。尤为突出的是，对于理论和哲学的一般性研究，这些研究能够增进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现实问题具体的、共同的理解，曼德尔一生到底给予了这些研究多少关注？年轻的激进主义者通常对这个事实不耐烦，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针对社会不公基本的、颇为深刻的、完全合理的义愤之辞，应该足以让这个剥削和压迫的体制土崩瓦解。因此，只要有少部分阅读本书的读者能够受到鼓舞，并对曼德尔分析时所倚重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和哲学进行一种更为深入的研究，就基本达到了本书的目标。

同时，人们一定会注意到，曼德尔总是一次次回归许多特定的主题（这里所列没有特定的顺序）：纲领与活动中可以区分革命者和改良者的那些方面；一种 20 世纪革命观点的现实可行性与一切希望通过改良资本主义解决人类问题的观点的彻底乌托邦本性；革命运动认识历史真理

并从各个方面表达现实的绝对必要性——即使（或者尤其是）有时候可能会令那些运用自身意识形态之斧讥讽挖苦的人不那么舒服；民主总体上在革命党内部以及群众运动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关于国际斗争与国内斗争相结合的辩证法；在革命进程的成熟期，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作革命主客观因素的复杂相互关系；工人阶级的核心革命作用，然而这却不能成为拒斥其他斗争形式重要性的理由。此外，还有更多的主题。

曼德尔在这些著作中的所有近期预测，甚至是历史预测，在时间上无法一一得到验证。例如，当在《马克思主义对今日革命的辩护》（The Marxist Case for Revolution Today）中读到曼德尔关于苏联未来可能发展方式的预测时，我尤为震惊。这一预测同那个世纪苏联发展现实的比较（甚至同这篇论文完成后一个较短时期的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做出这个声明时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即苏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事情或许正如它的近况一样，充满了急剧转变和诧异，可以想象，这甚至会迫使我在这些文字付梓之前，修改我说过的话）。

但是，这种不一致性不应令我们过于沮丧。毕竟，每一个曾经落笔纸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过类似的失误。这是事实，因为任何试图以我们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做出的预测必然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要受到我们做出预测的那一时刻的现实条件的制约，并且要以我们对于“现实是什么以及作用其上的社会力量是什么”的有限知识为基础）。我们经常发现条件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因为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不够全面，对那些在表层下运行的隐藏不露的某些因素未加关注。曼德尔本人在《建立第四国际的理由及其今日缘何依然有效》（Reasons for Founding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and Why They Remain Valid Today）一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该问题深受托洛茨基 1940 年逝世前——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能发生什么——这一预测的影响。

然而，从这一问题出发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本身是无效的，或者否认马克思主义持续做出普遍性预测（可以作为我们日常活动的指南）的重要性，那也将是错误的。同任何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发展的，它首先形成关于现实世界的概念，然后随着现实的展开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理论和现实) 不断去发展验证它们。因此，为了思考那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事物，要努力改进我们的理论学说。

只有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想象成它最拙劣的模仿者们所鼓吹的那种形式时（如同一个包括大祭司或长老会的教会，借助经文或某种全知全能的力量，总是已经和将会为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一切答案），我们才会相信对于阶级斗争中某一特殊事件所做的错误预测会使我们的基本方法无效。人们或许同样可以认定所有的医学都是欺诈，理由是病人有时候会因为他们的医生没有预见到并发症而死亡。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教派，这便是它能够合法地被称为科学的原因（尽管与医学相比，它的确具有更少的精确性，或许艺术也比它更为精确）。我能够确定无疑地声明，像曼德尔那样效忠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将会在这些书页中找到他们并不认同的具体要点（我之所以如此确信，部分原因是我自己发现了大量这样的要点）。

所有这些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不仅我们科学的发展是通过在现实中验证知识取得的，其他科学也有类似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个体与现实不同阐释之间的积极理论（甚至是争论）斗争不断向前发展的。再强调一次，从来没有谁可以拥有一切答案，我们要么通过一种集体努力达及真理，要么根本无法发现真理。

于是，这就需要本书（或就此而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读者保持批判能力，书中所说的一切均无须不加怀疑地接受。一旦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就需要从曼德尔在这些书页中发展出的具体观念和关于世界的一般方法中学习大量知识。

第一部分
历史文论



1. 托洛茨基：其人其业^{*}

“无论是当前的无产阶级，还是刚刚退场的无产阶级，列宁都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镜像、形象。……他从民族背景中吸取自身所需，用来实现所有伟大的历史革命行动……”于是，托洛茨基就这样刻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创立者，一如列宁今日之所现。除了是俄国古老过去整体局势的产物之外，即一种将独裁缺陷和自身特有流弊结合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为了不致滋养流行于西方国家工人贵族中的和平演变幻想而发展着。列宁身上没有一点宿命主义被动论的痕迹，其他方面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痕迹，作为俄国革命的领袖，他青年时就是行动派。事实上，列宁一生是这样一种最为突出的例证，即汇集人格的所有力量去实现阶级的历史目的。在1914年之前，西方工人阶级运动的领袖只是将列宁视为一个难以理解的捣乱分子，但在1914年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又开始痛恨这个不安分的仇敌。

托洛茨基则有所不同。尽管童年在农场里度过，他受本民族农民力量的影响远不如帝国主义世界大都会对他的影响大，尤其是头两次流放（伦敦、柏林、维也纳、巴黎、马德里、纽约）带给他的影响。在所有伟大的俄国革命家当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具欧洲人气息、吸收西方文明最彻底的人。他把俄国工人阶级内部完好无损保留下来的革命动力注

^{*} 本文1947年7—8月间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刊物 *Fourth International* (Vol. 8, no. 7, New York, p. 205) 上。



入西方文明，从而成功地使革命在 20 世纪达及它的最强音。

对列宁来说，行动是其生命的自然流露，从具体实际出发，他将行动铭记于大量与之不可分离的观念之上。对托洛茨基来说，行动是思想的自然实现，行动围绕着把握具体实际而展开，从来没有让它溜走过。这里仅有一丝差异，但正是这个细微差别使他们始于 1917 年的合作日臻成熟。

这两位巨匠并没有过着传奇英雄般的简单生活，就这一点，托洛茨基说，“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才会把列宁想象成永不犯错的圣人”，他们的缺点和过失与其思想深刻的本性紧密相连。对于离开无中介的领域并将作为革命激励力量的无产阶级概念推向尽头，列宁是缄口不谈的。在列宁看来，不提前排除无产阶级政党与最终依赖农民的政党之间形成一种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就意味着没有提前排除最快、最直接、最低风险的推翻独裁政治的道路。^[1]然而，这个错误始终存留在列宁革命气质的框架内，他将再也无法与孟什维克主义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同样将俄国革命的特征描述为起先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界限的制约，随后将历史进程领导权拱手让给“自由”资产阶级（托洛茨基说这是不存在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列宁严格转向寻求全部“理论”问题解决方案的意愿仍显得过于死板，以至于其无法想象无产阶级直接获取权力。12 年后，当托洛茨基的理论实现时^[2]，幸亏有列宁的领导，在理论和行动的必要转向上，他一刻也未迟疑，但在关键时刻他难道没有说过“这让他头晕”的话吗？

就他本人来说，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处于与孟什维克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极，长期以来因过于相信不同政治思潮可以仅仅通过知识劝诱结合在一起而误入歧途。^[3]尽管那时还很年轻，托洛茨基提出不断革命的概念确是一个天才之举，该概念成为我们理解 20 世纪绝大多数革命的关键，进而也将他同其他俄国革命家以及所有的欧洲革命家区分开来。然而，托洛茨基始终太过留恋“传统的”、不充分的西方社会民主组织形式，以至于无法理解分裂的必要性，在欧洲工人运动领袖们的眼里，分裂通常表现得很残酷。对于一切欧洲国家来说，运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方法是必须的，甚至列宁自己都还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尽管在实践中为组织的和解而战，托洛茨基一生对宿命论却深恶痛绝，他并不满足于德国领导者抛出的空洞希望，即认为“革命”进程将“自动”令列宁“夸

大其词的言论”消弭于无形。这就是他为什么允许自己为“八月联盟”(August bloc)这个声名狼藉的组织工作的原因,要知道,这个联盟是彻底敌视他的政治理念的。这还可以用来解释如下悖论:在强烈意志支配下的列宁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尽管在自己党内率先同中派主义的组织概念断然决裂,却长期对考茨基保有景仰。而对托洛茨基来说,那些关于欧洲工人阶级运动更为深刻的认识令他远早于列宁便参透了考茨基主义者意识形态终将破产,然而,多年来他却一直是俄国中派主义^[4]组织原则的拥护者。

但是,真正的伟大人物都具备这样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可以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超越自身特定的局限性,把自己擢升到历史向他们的阶级提出的紧迫任务的高度。1917年,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这种转变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任何冲突和内部矛盾。同样,列宁一生都超人般地固守他曾经接受的政治原则,在俄国革命的第一天,他便抛弃了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则(正如他所说,“事过境迁”),成为一个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的党派信徒。作为“调解人”,托洛茨基在同一时刻以同样迅捷的速度认识到(历史的讽刺在于,正是斯大林促使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不再可能”实现“统一”,进而成为“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语)。只有革命本身才能以最小的困难实现这种双重转变,因为这两个真正的革命家已经感觉到并认识到,对于使他们的阶级走向胜利来说革命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经常指控托洛茨基,说他在对待党的态度上过于野心勃勃和“私人化”,在对待同志的态度上过于傲慢。这些指控是荒唐的。当拥有高品质的心理洞察力的列宁将托洛茨基部分“关注事物管理方面”的缺点说成是一种“过于明显的魅力”时,他有着一种清晰的洞见。然而,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安杰利卡·巴拉巴诺夫(Angelica Balabanov)(经常不过是获取一些来自楼廊碎语的花边新闻,并将之转化为历史的动力)也做出了这一颇具洞察力的评论:在革命期间,恰恰就在群众将托洛茨基举在肩上那一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抹去性格中明显“私人化”的特征。当托洛茨基手中掌握着发动革命的所有线索时,“领袖”的傲慢恰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离他更远。安杰利卡认为,凭借天赋的机敏,托洛茨基在最有必要(然而对大多数凡人来说认识到这一点却非常困难)的时刻,知道如何开展最严厉的自我批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



到了性格的真正力量，这是一切伟大行动的基础。

在托洛茨基身上，丝毫没有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后者认为，人们可以像手相占卜师通过手的纹路理解未来那样利用统计学理解历史进程。远远超出了作为独立学问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托洛茨基试图捕获人类现实的方方面面，这便是他当之无愧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位历史学家的原因，这也是他在“过去的完整复兴”方面比其他任何人表现得更为出众的原因，要知道这种“复兴”自朱尔斯·米什莱（Jules Michelet）时代以来就只能在梦里出现。^[5]凭借他那锐利的目光，托洛茨基很快便将伟大的群众运动与政治领袖的个性、面包价格与文学报刊的语调、证券交易的变动以及沙龙中无意听到的妙趣横生的逸闻尽收囊中。他强有力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熔炉，在这里，历史的所有构成要素可以被重塑。托洛茨基著作所涉及的主题从哲学开始，中经政治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诡辩术、历史学、传记、军事技术，直至新闻评论和艺术批评。如何归总这项如此广泛的事业？它仅仅是一项政治新闻事业吗？或者是一种“应用的马克思主义”吗？它确是如此，但绝不仅限于这些。它是为了人类的转变负责，对人类整体所做的一种巨大且持续的努力。它也是这样一种持续努力，即将人类活动各个阶段诉诸自觉批判，从而使它们可以在人类批判意识的指导下实现转变。

普遍的兴趣

尽管托洛茨基有着普遍的兴趣，他却游走于浅尝辄止和博采众长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为了现实有效，这种普遍兴趣需要达成基本的一致性，需要被整合在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的观念下，即认为世界永远是“生成”的，它仍将保持一种统一的样态，同时拥有清晰的轮廓。比任何其他当代思想家更专注于人类现实的多面性，托洛茨基对文件资料的运用十分准确、严密，甚至达到了迂腐的地步。同时，他的观点十分宽泛，能够脱离当前利益，把握事件的基本方向。从直接观察到的无数人类活动的现实出发，托洛茨基运用魔法雕刻家之手描绘了一系列基本轮廓清晰可见的宏伟的景象。